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



“从新闻宣传的研究转向大众传播的研究”、“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这是新闻学界人士近年来经常议论的一个问题。对于新闻学界的教师来说，如何认识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如何看待前者与后者的转递，无疑是教育思想讨论中在思想讨论中的一次发言。早在1957年春出版的《新闻学季刊》上，美国学者施拉姆(Schramm, Wilbur)就曾发表文章，主张对新闻学进行定量(quantitative)处理；由人文(humanistic)方法转向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方法；由著名人物(great men)的研究转向对新闻制度(press and press systems)以世界性的广泛视角进行研究。人们通常把施拉姆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新闻学研究进入行为科学时代的标志。在社会科学中，通常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列为基本的行为科学。施拉姆以个人行为(individual behavior)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中，通常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列为基本的行为科学。施拉姆以个人行为作为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来研究人的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在施拉姆发表那篇文章前的8年，

新闻与传播：

研究方法探索 与文化意义阐释

屠忠俊◎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

新闻与传播： 研究方法探索 与文化意义阐释

屠忠俊◎著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探索与文化意义阐释/屠忠俊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609-6759-2

I. 新… II. 屠… III.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766 号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探索与文化意义阐释

屠忠俊 著

责任编辑:苏克超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何 欢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8.75 插页:2

字 数:354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一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由此前行13年,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之中,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应是臻于成熟之时。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在后30多年的时间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在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由于新闻、传播的业务开展与新闻、传播实业组织的紧密联系,中国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和新闻、传播的业界人物进入或一度进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或者,考虑到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研究占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真正完全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是一批新闻传播学界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们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就人数而言,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1978年,中国恢复新闻学硕士生教育;1985年,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有了博士后流动站。目前,中国内地共有新闻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7个,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师队伍达到万人的规模,其中教授约

1000人。加上由他们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新闻传播学科的文献传布和学术交流方面有着强烈需求的学人群体人数当以十万计。

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在五大洲各国,还有一大批主要聚集在各高等院校的华裔、华人学者从事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他们或以汉语华文,或以所在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学术交流和撰述,并且十分关注汉语华文的新闻、传播。他们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成员。“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特别注意收录这批学者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著述。文丛以“中华新闻传播学者”而不以“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冠名,其用意也在于此。中国内地出版的系列文集,注意收录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将海外华人学者纳入大中华的学人序列,在海内外华人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中,这一做法是颇有见地之举,值得称道。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首倡其事,并具体组织实施。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于1983年创办新闻系,在中国开理工院校办新闻教育之先河。建系伊始,他们就制定“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方针,走特色取胜的道路,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的能力践习等诸多环节上有所创新。1998年,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强力推行人文社科研究与最新信息技术的应用的大跨度交叉,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传播文化与传播科技结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特色取胜的办学理念,并不断强化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已是一个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全功能结构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基地,在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上,也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出版“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既体现学院主事者致力于新闻传播学科基础建设的战略谋划,又反映了他们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渠道畅通而奉献力量的良苦用心。对此,我是颇为赞赏的。

学术共同体可以分为一些级。全体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可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各一级、二级、三级学科旗下的学者也可以视为某一级上的学术共同体。就新闻传播学科的情况而言,由于高等院校教师占学者群体的绝大多数,而重点高等学校出于办学的需要,在学科下的专业设置上一般有求全的倾向,往往在一所学校形成一个学术面向大体覆盖学科全场域的教师组合,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处于级层基础部位的学术共同体。“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第一批著作主要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写。他们和他们在该学院的同事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学术共同体。这一批著作的研究内容,既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涉及新闻自由与法治这样紧迫而敏感的问题,又涉及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涉及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进程的当下现状考察;既有新闻传播业务方面的深入思考,又有新闻传播文化意义的多方位阐释;既有政治传播学、传播心理学、媒介社会学等新闻传播学新学科的开拓性探索,又有以新的视角对传统的报纸传播、电视传播和现代的新媒介传播的解读;既有紧密联系市场经济的品牌传播研究,又有贴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中不乏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独具只眼、直面现实之作,相信能给读者带来多方面的启迪。

我与这一批著作的作者都曾有过接触、交往,与其中一些作者更是在各类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过从甚多。华中科技大学位于中国腹地的武汉市,这些作者在荆楚文化的熏染下献身于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勤奋、执著、“应物不滞,飭己有规”,我是有所闻,更有所见的。读到他们收入文丛的著作,“绿叶素荣,纷其可喜”,使我感触良多。“漾文澜而日富,扩学库以逾宏”,是我对他们的殷切期望。

我更希望“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推出计划中的后续批次,为全国、全球的华人新闻传播学者开辟一方“曾枝剌棘,圆果抃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学术园圃。

是为序。

方汉奇

2010年6月于北京

总序二

华中科技大学,曾先后用名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1983年,华中工学院创建新闻系,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办新闻教育的理工科院校。办系的倡议者和推动者是朱九思院长,他认为理工科院校应该办文科。1998年,新闻系改组为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据说院名是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周济教授建议的,他认为21世纪是信息化世纪,而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相结合的效果最佳。还有老校长杨叔子院士,也是新闻教育的积极支持者。这些情况表明,华中科技大学的领导人在办学上是有远见的。

远见要成为现实,需要有多种条件和多方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师资队伍。华中科技大学及其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很快组成了一支阵容整齐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们工作与生活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的氛围中,为培养人才和建设学科而辛勤劳作,使学院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出版这套自选集正是为了“积学以储宝”——记录教师们的业绩与智慧,并发扬光大。

自选集是自定篇目的,具有鲜明的个性。但全套自选也有共同之处,而且这种共同之处体现与渗透在各部自选集之中。我以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这套自选集的共同之处主要是显现了自由、务实的学风。所谓自由,即学术自由,自由选题,自由论述,自由讨论;所谓务实,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重实证,重案例,重材料。这也许是由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之光芒的折射,我们在阅读这套自选集时可以领略一二。

此前,我国已经出版过几套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的自选集,影响不小,效果很好。这是因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后起者,学术积累不多,其研究成果理应加速面世,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迫切需要这种学科作理论向导,所以多出有关著作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这套自选集的出版,对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是一项重要贡献,值得热烈欢迎!

丁淦林

2010年6月于上海

总序三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大职能。教学离不开科研,高质量的教学需要高水平的科研做支撑,故世界一流大学均把科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就是从事新闻教育的大学教授们科研成果的集萃。

在大学神圣殿堂里,新闻教育属于新生代。在世界范围,如果从沃尔特·威廉姆斯 1908 年创建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算起,至今才刚过百岁;在中国,一般把 1918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至今还不到一百岁。与有 900 多年历史的法律教育、神学教育等比较起来,新闻教育实在是年轻得不能再年轻了。虽然年轻,但是“后生可畏”——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新闻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认可和普及,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环境魔幻般的演变,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世界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和形成了不同的新闻教育模式,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以支撑起本国的新闻事业发展。

世界新闻教育虽然有几种不同模式,但我注意到,无论哪种模式,成功的新闻院系的教育活动都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注重实践性,强调人文性。所谓实践性,就是高度重视教学实践环节,在新闻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能力——包括新闻事实的发现能力和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在内的新闻产品的制作能力,为此,新闻院系将办专业与办媒体并举,把新闻教学过程与新闻实践过程融为一体;所谓人文性,就是高度重视人文主义素质,强调新闻伦理教育和新闻精神培养,为此,新闻院系将职业伦理和法制课程作为重要教学内容,把新闻记者的责任感、道义感贯穿于新闻教育过程的始终。

新闻教育这两大特征是由新闻学的性质所决定的。新闻学是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新闻产品制作过程与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属于一门应用型人文学科。当年,新兴资产阶级先驱们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高喊着“出版自由”的口号,以刚刚诞生的报刊为武器,以争取“出版自由”为突破口,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进攻,掀起了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阵狂飙;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逐步成熟,新闻传媒纷纷离开政坛,回归市场,走上企业化发展道路,廉价报纸的诞生,掀起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二阵狂飙,“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报刊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但是,过分的市场刺激,使黄色新闻泛滥成

灾，一场“道德保卫战”随之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诞生并走向成熟，新闻教育开始跻身大学讲坛。普利策等人呼吁，经过高等教育培养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这样的新闻记者既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更是“社会的捍卫者”。可见，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立足大学讲坛，首先不是以“学理”，而是以“精神”。

分析新闻学的性质和新闻教育的特征，可以得知，要搞好新闻教育，一般应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教学实践阵地，一个是学术自由氛围。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的新闻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跻身全国新闻教育界的前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教育是朱九思先生（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于1983年创立的。朱九思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老新闻”。他1938年投奔延安，1946年6月调到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冀热辽日报》任副总编辑，后历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天津日报》总编辑兼天津广播电台台长，《新湖南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作为“老新闻”，朱九思先生根据学校学科优势和新闻学科的特点，为新闻系的专业教学和学科建设制定了“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八字方针。为了贯彻“应用为主”的方针，朱九思先生一边创设新闻系，一边创办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改革信息报》，他自己亲任总编辑，新闻系主任任编辑部主任，教师当编辑，学生任记者，把教学与实践融为一体，既培养新闻人才，又制作新闻产品，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的光辉篇章。

同样是为了贯彻“应用为主”的方针，朱九思先生还从新闻媒体界调进一批有实践经验的记者、编辑组成了新闻系最初的教师队伍。在他看来，新闻系教师有新闻实践经历比博士学位更重要，他严格规定，没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没有资格担任新闻系的专业课教师。教师“干新闻，教新闻”，学生“学新闻，干新闻”，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区别于全国其他新闻系的显著特色，并形成了光荣传统。

朱九思先生还特别倡导大学要有大学精神。他说大学里“还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要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讨论，主张“科学研究无禁区”。（《探索与发展》，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210页）新闻系创办后，他支持创办了学术刊物《新闻探讨与争鸣》，鼓励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学术自由氛围，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新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土壤。有一个典型例子：进入21世纪，这里引进了“前卫”新闻学者孙旭培先生，并为他营造一块可以放心、安心、静心做学问的绿洲。孙先生在这里工作了10年，教学上深受欢迎，被学生推选为“我最喜欢的导师”；科研成果丰硕，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孙旭培先生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以在这里10年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果向世人表明，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提倡“独立之人格，自由之讨论”的学校，是一



所有大学精神的学校,是学者做学问的好去处。完全可以这样说,这里的新闻学研究 and 新闻教育能走在全国前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里的“大学精神”。

以上两条,是一般规律,是“入主流”。此外,华中科技大学办新闻教育还特别注重特色发展,建系之初提出“应用为主,交叉见长”八字方针中的后四字就表明要走特色发展之路。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建系筹备组组长姚启和说:“在理工院校办新闻系,要走文、理、工科相结合的路子,发挥我校理工文管相结合的优势,这是开始建系时就明确提出的指导思想。”在建系 10 周年的时候,他又说:“以后在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发挥学校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优势,适应时代要求,以应用为主,以交叉见长’的办系方针。10 年的办学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文理渗透”、“交叉见长”的方针越来越显示出远见性。

任何一项新传播技术的出现,都会孕育出一种新传播媒介,随之带动传播观念的更新、传播手段的进步和新闻传播人才观的变化,从而促进新闻传播教育的革命。原校长周济院士深有体会地说,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新闻传播类专业办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以强大的理工科为背景,实行学科交叉,发展特色文科。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这里的新闻教育在“学科交叉”上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1997 年初,新的学科发展思想和办学理念基本形成,可以概括为:实行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人文、社科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传播文化与传播科技紧密结盟,培养既有扎实人文、社科功底,又能掌握现代传播工具的现代化新闻与信息传播人才。1998 年,学院成立时,周济校长还特意命名为“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并于当年在全国首创网络新闻专业。经过几年“文理交叉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的研究与实践,培养“文理交叉复合型新闻人才”已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品牌。

一句话,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既“入主流”,又“创特色”,在中国新闻教育界独树一帜。

这套文丛,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入主流,创特色”的产物,它沐浴着喻园“独立、自由”大学精神的阳光走来,体现了“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教育理念。这套文丛中,有的偏重学理,也有的偏重术理;有纯文科的,也有文理交叉的。但无论哪类文章,都有较高的质量——理论探讨言之成理,应用研究有可操作性,很值得一读。

第一编 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 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1)
-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思考……(7)
- 传媒业经营管理研究中的术语伦理学问题
——以“媒介、媒体与传媒”和“事业、企业与产业化”为例……(23)
- 传播学研究中的 23 个基本问题……(36)
- 传播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跨度……(50)

第二编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丛林中的探索

- 心理分析的运用:自我传播与大传播……(63)
- 维量分析的运用:维量分析与传播类型划分……(71)
- 必须重视解释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78)
- 关于介绍传播学研究中的解释学方法的几个问题的说明……(86)
- 精确新闻与作为新闻写作基础课的高等数学……(92)
- 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状态的马尔科夫链……(98)
- 加强新闻业统计研究是深化新闻业管理学研究的一个关键……(104)
- 新闻业统计:指标体系设计……(110)
- 可读性的统计学考察……(186)
- 信息论方法的运用:广播、电视、报纸广告价格之比较……(193)
- 控制论方法的运用:从价值控制模式看新闻同宣传和艺术的区别……(198)
- 系统论方法的运用:耗散结构论与新闻学……(204)

第三编 新闻人的文化业绩

- 新闻人角色:西方社会“无冕之王”之历史与现实的考察……(215)

黄遵宪:新闻诗摭谈……(223)

章太炎:章太炎与《民报》……(229)

斯诺与西蒙诺夫:《西行漫记》与《战斗着的中国》……(237)

第四编 从乡校到因特网:中国公共领域的演变

第五编 传播文化

海外华文报刊的文化使命……(255)

华夏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262)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伦理问题的道德哲学思考

——纪念孙中山“行易知难”说提出 90 周年……(270)

传播什么? 由什么人传播?

——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传播理念的两个问题的论纲……(280)

探索新闻与传播 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

“从新闻宣传的研究转向大众传播的研究”，“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这是新闻学术界人士近年来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华中理工大学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对于从事新闻学教学的教师来说，如何认识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如何看待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无疑是教育思想讨论中应该注意的一个具体问题。笔者想在这里陈述一点粗浅的看法，作为教育思想讨论中的一次发言。

早在1957年春季号的《新闻学季刊》上，美国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新闻学研究的四个趋势：由无定量(nonquantitative)处理转向定量(quantitative)处理，由人文(humanistic)方法转向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方法，由著名人物(great men)的研究转向过程和结构(process and structure)的研究，对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体制(press and press systems)以世界性的关注视角进行研究。人们通常把施拉姆这篇文章的发表，看做是新闻学研究进入大众传播学研究时代的标志。

施拉姆所说的行为科学，指的是研究人类的个人行为(individual behavior)的科学。在社会科学中，通常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列为基本的行为科学学科。所谓研究个人行为，并不是指研究个别人的行为，而是指以个人行为作为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来研究人的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在施拉姆发表那篇文章的前8年，即1949年，芝加哥大学曾举行过一次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研讨会。与会学者经过讨论，决定用“行为科学”这一名称来称呼各门研究“行为”的

学科。之所以采用这一名称：一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中立名称，既能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接受，又能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接受；二是因为它不会刺激美国国会中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之流的患有“反共歇斯底里症”的右派议员，免得他们把“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误认成“社会主义”(socialism)。施拉姆所沿用的就是这个8年来在学术界广泛采用、具有其特定含义的学科群名称。

简单地回溯一下这段学术史，笔者想到的是，“从新闻宣传的研究转向大众传播的研究”也好，“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也好，借用施拉姆的一个说法，“以世界性的关注视角”(world-wide concern)来看，已不是什么很新鲜的说法，最迟在40年前，已见滥觞。而世界性的关注视角，当然可以说是树立“面向世界”的教育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有的学者提出“新闻学要同国际惯例接轨”的说法，这里，“国际惯例”一词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恰当与否，自有商榷的余地。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比如“以世界性的关注视角来规划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对问题的表述或许更准确一些。毋庸讳言，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主要发源于欧洲，后来又昌盛于美国。世界性的关注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要关注欧美的对口学科的发展渊源、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所需要完成的基础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吸收、借鉴对口学科的欧美学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研究方法上的学术成果。施拉姆所总结的新闻学研究进入大众传播研究时代的四个趋势之所以对我们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就是因为这四个趋势都是研究方法上的趋势，而没有牵涉诸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评价之类的问题。

“新闻学研究进入大众传播研究时代”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提法，因为在“新闻学研究的大众传播研究时代”还有多种可能的情况：传统新闻学与新兴的传播学共存；传统新闻学完全被传播学所取代；传统新闻学被改造为一种新面目、新体系的新闻学，这种新面目、新体系的新闻学又与传播学共存；新闻学与传播学交叉，形成一门新学科(比如，叫做“大众传播新闻学”或“新闻传播学”之类)。到底会是哪种情况，需要深入研究才能作出预测，或者通过以后若干年的学科发展实践才会见出分晓。笔者认为，探讨这个问题，前提是要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性质。

有一种简单化的看法，认为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差别不过是研究范围略小或略大一些而已：新闻学以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及其活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大众传播学则在印刷媒介以外，还兼以电子媒介(广播、电视)及其活动规律为研究对象。还有一种说法更断言：新闻学主要研究报纸、杂志，传播学主要研究广播、电视。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分真的不过如此，那么，一个新闻院系，只要在新闻



学专业以外还加办广播电视专业,就可以算作实现了从单纯新闻学研究向开展传播学研究的转变。

其实,新闻学与传播学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学科。新闻学是一门人文学的应用学科,传播学则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是学科分类体系中两个不同的领域。笼统地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视为一类,统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不过是某些场合下的一种方便说法。但在规划学科建设的大计之时,像孔夫子那样,为政奚先?“必也正名乎”,严格界定新闻学的人文性和传播学的科学性是很有必要的。

人文学(humanities)是学科(field of studies),而不是科学(science)。人文学的人文性表现为:它体现着人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它探讨人的存在价值和人性的精神表现,它把诸如信仰、情感、道德、美之类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它的立场是主观性(subjective)的,而不是客观性(objective)的。而科学性则要求完全的客观性,任何一点主观性都必须予以摒弃。

科学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自然科学又有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分。科学性的表现,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又有程度的差别。通常认为,物理科学的科学性最高,其次是生物科学,再次是社会科学。物理科学的知识依靠受控实验积累。所谓受控实验,是指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包括观察、测试),任何不可控的偶然因素起重要作用的实验结果,都被视为不足为据。科学家在受控实验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物理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构造性体系。在构造性体系中理论判断的大前提之间有着严格的构造性联系,理论判断的构造性结合又可生成新的理论命题。整个理论体系表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完美的有序性。社会科学在受控实验和构造性体系方面,显然不能达到物理科学已经达到的程度。

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在内)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是因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坚信:人类行为(包括传播行为)和社会现象(包括大众传播现象)虽然极其复杂,但总有规律存在;运用客观的观察程序及分析方法,就可以寻找这些规律;用以寻找规律的程序和方法是可以交流(communicable),即既可以传授(teachable)又可以学习(learnable)的;运用程序和方法的过程和结果,也是可以交流,即既可以检验(testable)又可以证实(verifiable)的。

施拉姆所指出的“由人文方法转向行为科学方法”的趋势,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者学习、掌握、运用上述程序和方法的趋势,美国行为科学家柏瑞森(Berelson Bernard)和史丹纳(Gary A. Steiner)曾把上述程序和方法的要则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公开性。程序和方法,过程和结果,都能为受过同专业的学术训练的人所

了解。

(2) 确切性。理论命题所指涉的概念,都有严格界说的定义,并能通过概念指标予以测量。

(3) 客观性。资料的收集、数据的解释,都以事实为依据和归宿,不允许研究人员存在个人偏见。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4) 可重复性。同行按同样的程序和方法操作,在同样的过程控制条件下,应能重复得到同样的结果。

(5) 可积累性。被社会科学的研究证实了的原作为假设而表述的理论命题,可作为以后进行研究引以为据的理论前提。

(6) 预测性。被社会科学的研究证实了的理论命题可预测以后将会出现的行为和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这6条要则实际上是物理科学的研究“可控性”和理论“构造性”的科学性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情况下的另一层次上的表述。笔者认为,落实“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倡导运用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的程序、方法进行研究。为此,要积极鼓励有关人员改进知识结构,学习、掌握这一套程序和方法。

谈到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的程序、方法,就会联系到施拉姆所指出的另一个趋势——“由无定量的处理转向定量的处理”,而“定量处理”的提出,又要牵涉到数学手段的运用问题。数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学科,同逻辑学一样,它是一门抽象的和形式的学问,是既独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各学科,又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各学科的学问。钱学森把数学称为“被认识了的人思维规律系统化了的学问”,认为应将数学放在学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上。所谓特殊地位,笔者认为就是“普适地位”。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任何事物,包括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事物和作为传播学研究对象的事物,都只有通过量的规定性才能被精确认识。因此,各门学科的研究课题原则上都可运用数学手段。

美国数学家汤普森(Thompson Maynard)认为,当一门学科有进展时,伴有数学化增强的趋势。数学化的由弱到强,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数学的运用仅限于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数据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在第二个阶段上,人们在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出经验定律。当人们能创造出一个数学结构来解释经验定律时,数学化的进程就到了第三个阶段——建立数学模型的阶段。在数学化进程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研究者在数学模型的反复运用与检验的过程的基础上,获得在学科领域中的科学洞察力,揭示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层规



律。笔者所见到的一些传播学研究成果,其数学化的强度多半在第一、二两个阶段上,少数进入第三阶段的成果,其数学模型都多少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第一、二两个阶段的运用,大体上就是前面所说的寻找行为及现象的规律的观察程序及分析方法。

具有高级中学程度的数学知识,再加上一定的结合专业的应用数学训练,学会在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中进行定量处理,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克服或防止的是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讨厌数学、嫌恶定量处理,对“数学方法”避之唯恐不及,在教学中,迁就一些学生对数学课程味同嚼蜡的心理积习,主张取消新闻专业学生的数学训练。另一种倾向是不严肃地使用数学方法,似是而非,把数学方法的应用引向谬论。为了说明这种倾向,我们姑且举一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的例子。亨廷顿在向哈佛大学学生演讲时,用一系列方程式来说明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的下述概念间的关系:(a)社会动员;(b)经济发展;(c)社会挫折;(d)变动机会;(e)政治参与;(f)政治制度化;(g)政治不稳定性。这些方程式是: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 $\left(\frac{a}{b}=c\right)$;社会挫折/变动机会=政治参与 $\left(\frac{c}{d}=e\right)$;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性 $\left(\frac{e}{f}=g\right)$ 。哈佛文学士出身的美国数学家科布利茨(Koblitz Neal)对此事评论道:亨廷顿从来没有为告诉读者在什么意义上这些关系是方程而操心。(a)至(g)中是否有一项能够测量并指定一个数值,是很值得怀疑的。测量的单位是什么?亨廷顿是否允许我们用中学代数熟知规则来运算这些方程?如果可以,我们就会推出例如 $a=b \cdot c=b \cdot d \cdot e=b \cdot d \cdot f \cdot g$,即社会动员等于经济发展乘变动机会乘政治制度化乘政治不稳定性。

当然,研究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也可运用人文学方法,研究人文学也可运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具体到我们的论题,就是说,研究大众传播学可运用传统新闻学的方法,研究传统新闻学也可以运用大众传播学的方法。施拉姆所说的“由著名人物的研究转向过程和研究结构的研究”,就是指传播学研究对新闻学研究的继承及新的特色。新的特色就是研究过程和结构,这种研究要借助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新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研究过程,传播学常借助控制论、突变论;研究结构,传播学常借助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研究过程与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时,传播学又常借助信息论和协同论。不是说新闻学的研究就没有借助上述的“老三论”和“新三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其理论体系中多的是规范性、评价性的命题,其具